

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张晋藩*

内容提要 从夏、商、秦、隋四朝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得民则昌,失民者亡”是一条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实际出发,总结出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兴国安邦,在得民心;以农为本,改善民生;宽以养民,改善民生;爱民富民,民安国强;富则教之,移风易俗;矜恤弱者,重视人命。民本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但依然为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 民本 利民 爱民 教民 以人民为中心

目 次

- 一、夏商秦隋四代兴亡史展示了民本的价值
- 二、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
- 三、民本思想的历史镜鉴

*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中华民族经历了 5000 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发展进程,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创造了先进的法治文明,培育了饶有特色的中华法文化。在浩瀚的中华法制文明史中,民本思想与民本理念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也是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2015 年 10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会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①这表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古代民本文化的特殊关注。

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虽然几经沧桑,但始终凸显了民的价值和作用。民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没有民的社会性生产,社会难以延续,民族难以生存,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民又是国家军队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可见“祀”与“戎”是国家的主要活动。没有军队,国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无法保卫边疆和实现国家对内与对外的职能。在中国古代参加军队不仅是民的义务,也是民的权利。奴隶、贱民没有参加军队的资格。民还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赋税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国家活动的财政保证。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③。从夏朝立国时起,赋税便是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④历代不断地进行编户,以控制人户的数量,同时限制平民厮养奴婢,以扩大赋税的来源。民也是国家重大工程的兴建者。无论是修建水利工程,还是建筑城池、宫殿,民都承担着力役的义务。贞观元年(627 年),唐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共众所有故也。”^⑤

民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还创造了恢弘灿烂的精神文明。中华文化源头的多元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创造力。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也是独树一帜的,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创新性。以上足以说明民是国家的主体,无民何以为国。

本文一方面从夏商秦隋的兴亡史中考察民本的价值与史鉴意义,另一方面,从各家的民本思想和民本理念中理解民本法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它的历史借鉴。

一、夏商秦隋四代兴亡史展示了民本的价值

(一) 夏禹的五音听治与泰康的《五子之歌》

大禹受虞舜的禅让,建立夏朝以后,为了及时听到民众的诉求,排难解纷,在庭院中设置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⑥为了接待来访的民众,禹“一馈而十起,一沐

① 参见《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1 日,第 1 版。

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

④ 吴兢:《贞观政要集校》卷六《论俭约》,谢宝成集校,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17 页。

⑤ 《淮南子·汜论训》。

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⑥。大禹亲民、重民,深得民心。大禹本拟按传统禅位于益,但“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⑦。正是民众对夏之子启的拥护,使大禹有可能将王位传于子启,建立了王位世袭传子制度的家天下。

启在位期间,率军征伐曾经反对传子制度的东夷和有扈氏,并且制定了以禹为名的禹刑。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⑧。禹刑源自蚩尤所制定的五刑“剿、刵、椓、黥、大辟”。可见,启在位时国家制度的规模已有所进步。但启死后,泰康继位,荒淫无道,外出游猎,十旬不返,遭到夏民反对,被另一位部落之长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⑨。泰康兄弟五人及其母流亡在外,艰难困苦的环境使他们想起大禹的“皇祖有训”,有感而作“五子之歌”,其中最重要的是追思“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⑩。意为民可以亲近,不可以忽视、轻视,民是国之根本,只有巩固了国本,国家才能取得安宁。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民本理念最为精辟的总结,既富于哲理,更是充满了史鉴价值的精准表述,对后世影响深远。历来有作为的皇帝,都以此自警自诫,或以此教育子孙后代,作为治国之正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最早地、最集中地、最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成为传统法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五子之歌》不一定是泰康兄弟所作,而很可能是历史学家借助夏朝历史的兴衰之由总结出的具有高度理性思维和实用价值的规律性认识。

泰康失位以后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至少康时终于复位,此后“大人世及以为礼”^⑪,稳定了夏朝的统治。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甲时又出现了“诸侯多畔”的严峻形势。传至末代夏王桀,“残贼海内百姓,赋敛无度,夏民甚苦”。尽管桀把自己比作太阳,但广大夏民仍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愤怒呐喊。^⑫这时东方兴起强大的商族,利用夏民反对夏王、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用武力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的商朝。

夏朝的兴亡史雄辩地证明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是一条永恒的历史铁律。

(二) 周公重民取代商王重神的统治

商朝建立以后,商王汤深知商朝的建立是因夏民反对夏桀无道,奋起反抗所致。因此,他在立国之初,极力宣扬以仁义道德化民、教民,以取得民的拥护。一次,汤外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⑬。商汤施仁德于禽兽,使夏民深受感动,遂拥护商汤的统治。

⑥ 前注⑤,《淮南子·汜论训》。

⑦ 《孟子·万章上》。

⑧ 《左传·昭公六年》。

⑨ 《史记·夏本纪》。

⑩ 《尚书·五子之歌》。

⑪ 《礼记·礼运》。

⑫ 参见《尚书·汤誓》。

⑬ 《史记·殷本纪》。

商汤鉴于夏王荒淫无道,任意屠戮海内百姓,臣下明知其非,也不进行谏阻以致遭亡国之祸,因而制定“官刑”,以儆戒百官。其主要内容有:“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训于蒙士。”^⑭《尚书·伊训》虽不足以确证商之官刑,但在《墨子·非乐·上》中亦有“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的记载,而且首列“先王之书”为言,似不为无据。官刑就其内容而言,类似于最古老的监察法。商汤力求借助官刑,使继任为王者受到法律的约束。凡是知王之非而不劝阻者,处以墨刑。这是商汤为子孙后代所设计的长远之计。

除此之外,商朝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为了从精神上麻痹民众去服从商族的统治,商朝统治者还有意识地发展了夏朝的神权统治,把宗教迷信和政治统治糅合在一起,从精神上奴役和威慑广大奴隶和平民。他们虚构的“天帝”实际上不过是商族的祖宗神,天上的“帝廷”是地上“王廷”的投影,通过史官的占卜,沟通天人之际的联结,根据卜兆确定国家的活动。商朝的天道观,无论施政、育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直到商朝为周族所灭,才使得商朝的宗教观彻底破产,使当时的广大民众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商汤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商朝成为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诸侯“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而,传至末代帝王纣,却为“小邦周”所灭,原因就在于,纣王以为得到祖宗神的庇佑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肆意地“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剖比干之心,创炮烙之刑,屠杀忠良和无辜的百姓,丧失了民心。在关键的牧野之战中,“亿兆夷人”^⑮倒戈相向,使得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

周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神权不足恃,民心向背才是决定国家兴亡的根本因素。周文王曾向商纣王献上千里土地,请求废除炮烙酷刑,天下民众大悦。孔子称赞道:“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⑯继商而起的周朝的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兄弟子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⑰,并把民心与天命连接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的重要性。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⑱周公的一切施政都可归结到得民上。无论是实行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方略,还是他所创立的明德慎罚的法律制度,都谱写了中国古代法文化绚丽多彩的一章。由于周初的治国理政体现了重民、保民的指导原则,由此带来了“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⑲的成康之治。

以上可见,周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政策,把“敬天”落实到“保民”上。神的地位

^⑭ 《尚书·伊训》。

^⑮ 《尚书·泰誓》。

^⑯ 《韩非子·难二》。

^⑰ 《尚书·酒诰》。

^⑱ 参见前注^⑬,《尚书·泰誓》。

^⑲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遭到冷落,民的价值得到凸显,周初所推行的各项国家治理措施都归结到重民、保民和得民心上,并且第一次宣告了立法与司法的目的不在于刑人,而在于定是非、明曲直。周公特别赞赏司寇苏公刑用“中罚”以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民不受损害。这种刑罚的目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 丧失国本,秦二世而亡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皇帝制度,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同时,建立“海内为郡县”的地方制度,^{②①}成为当时世界上统一的多民族的最强盛的国家。《云梦秦简》的出土还确证了秦“莫不皆有法式”。作为早期封建制的法律,已经初步形成了法律体系和注释律学。比西方法兰克福封建的蛮族法典早一千余年,显示了中国早期先进的法文化。然而不幸的是,秦始皇被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天下莫予毒也”^{②②},于是修驰道、筑长城、建宫室,收取农民的泰半地租,力役三十倍于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②③}。犹有甚者,秦始皇破坏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规范,以意为法,恶性发展了法家所主张的重刑主义,百姓动辄得罪,“赭衣塞路,圜墙成市”^{②④},被肉刑者不可胜数,甚至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始皇荼毒百姓的结果,终于激起农民大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②⑤}。鉴于农民“苦秦法久矣”,所以刘邦入主关中时提出“三章之法”,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使秦民大悦,为刘邦取得天下奠定了群众基础。秦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奖励耕战,实行法治,锐意改革,使国势强盛,终于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然而,一旦秦逆历史潮流而动,失去了秦民的支持,就变得恍如泥足巨人一样瞬间崩塌。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给继起的汉朝统治者提供了广泛思考的余地,深以为戒。汉儒贾谊在《新书》中强调秦亡的教训在于“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②⑥}。东汉王符也持相同的观点,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②⑦},秦失民虐民焉得不亡。

汉儒同时提出,要以礼乐主宰刑罚,如同孔子所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②⑧}。“明德慎罚”作为一种方略发展到汉代,就渐趋于成熟,形成了系统的“德主刑辅”的法治模式。董仲舒关于“大德小刑”的一系列论述,给汉朝的“德主刑辅”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四) 只顾仓储,不惜人命,隋二世而亡

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著名的王朝。隋文帝杨坚在位19年(公元581—600年),他早年关心生产、注意民生、宽减赋税、讲求法制,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他在全

^{②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六》。

^{②②}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③} 《汉书·食货志上》。

^{②④} 《汉书·刑法志》。

^{②⑤} 贾谊:《过秦论》,载《全汉文》卷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8页。

^{②⑥} 贾谊:《新书校注》卷九《大政上》,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

^{②⑦} 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四《爱日》,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②⑧} 《论语·子路》。

国各地修建粮仓,囤积的粮食足够当时全国 870 万户食用 50 年。隋文帝亲自着手修订的《开皇律》,是魏晋以来立法经验的成功总结,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无论是犯罪概念的确定还是礼刑关系的结合,都取得了新的进展。然而文帝晚年喜怒无常,经常以言代法,法外施刑、杀戮无辜,而且不顾饥民死活,不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对此后世多有讥评。唐太宗曾经指出: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仓库盈溢,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不赈济灾民,漠视民众生死。至隋炀帝更“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终至失民心,亡其国。太宗感叹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②⑧} 鉴于历史教训,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②⑨}。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恶劣传统,不仅为隋炀帝继承,而且较之文帝尤甚。炀帝继位以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开凿运河,以备游览江州之用。又连年用兵征战不息,使得百姓脱离农耕主业,又兼徭役无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民不聊生,为逃避徭役,逃往外地的饥民往往饿死于途。这时反隋的农民大起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一个统一的繁荣昌盛的隋王朝只存在了 30 余年,便二世而亡,留给了继起的唐朝君臣以无限的思考和总结,最终还是归结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文帝父子都没能摆脱这个历史的局限。

二、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

(一) 民本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进一步彰显了民心向背对于国家兴衰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③①} 神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公元前 706 年,随国季梁谈祀神事时说:“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③②} 可见,在民与神的关系上,他以民为主而神为从,民为先而神为后,民是神的凭借与寄托,神的意志是民的愿望的延伸和扩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墨子也认为天神不过是“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③③},是人手中的工具。这说明在春秋战国兼并战争盛行的时代,凸显了人的作用,以至各派思想家都重视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务实的态度关注世事、人生,而对彼岸世界的神秘主义则存而不论,因此促进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至子产执政时,已经把人道与天道截然分开,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③④} 的著名论断,进一步把人从“以德配天”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激发了人的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性。

先秦时期的重民思想,经过儒家的提炼和升华,终于演绎成以民为本的价值理论,其

^{②⑧} 前注④,吴兢书,卷八《辩兴亡》,第 466 页。

^{②⑨} 前注④,吴兢书,卷一《君道》,第 11 页。

^{③①}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③②} 《左传·桓公六年》引季梁语。

^{③③} 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七《天志中》,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07 页。

^{③④} 《左传·昭公十八年》。

成熟的形态和标志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仁学”的创立,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位向民本位过渡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法制文明早熟的重要表征。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民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和弘扬,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铸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民本法文化。

(二) 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1. 兴国安邦,在得民心

孔子传承和发展了周初萌发的民本思潮,创立了“仁者,爱人”的学说,充分肯定了民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并以“仁”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孔子的仁学不仅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民本哲学,也为理政、司法、治世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③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③⑤}。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在此条件下,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进而提倡“仁政”,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而得天下,失民而失天下,得民而欲无王,不可得矣;失民虽欲保天下,亦不得矣”。^{③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⑦}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⑧}

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③⑨}他主张君为民而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④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④②}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④③},“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④④}。孟荀之说,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规律性总结,也是对国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后世论者,大都仿此,只是增加了时代的烙印而已。

除儒家的民本思想外,道家、法家也同样坚持以民为本。

老子提出“爱民治国”的主张。他强调君主应尊重民众的意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④⑤};又警告统治者应该善待百姓,不能滥施苛政酷刑,威慑百姓,“民不畏死,

^{③④} 《礼记·缙衣》。

^{③⑤} 《论语·颜渊》。

^{③⑥} 参见《孟子·离娄上》。

^{③⑦} 《孟子·梁惠王下》。

^{③⑧} 《孟子·尽心下》。

^{③⑨} 《荀子·王霸》。

^{④①} 《荀子·大略》。

^{④②} 《荀子·王制》。

^{④③} 前注^{④①},《荀子·王制》。

^{④④} 《荀子·议兵》。

^{④⑤} 《道德经》第49章。

奈何以死惧之”^{④5}；同时他告诫君主不要对百姓过度索取，“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④6}

早期法家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④7}“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中者王，得其半者霸。”^{④8}“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④9}“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⑤0}

慎子主张君主治国，“得助则成，释助则废”^{⑤1}，君主只有“得助于众”才能令行禁止。韩非说，上古之时，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造福于民众，民心大悦，“使王天下”^{⑤2}。

《吕氏春秋》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⑤3}“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⑤4}“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⑤5}

汉初统治者总结亡秦的教训，切身感觉到得民的重要性。贾谊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讎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⑤6}所以治国以民为本，应时刻牢记。

汉以后论者的中心点都在得民心上。三国时，吴国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⑤7}

唐太宗认真汲取了隋朝失民亡国的教训，强调“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⑤8}。他同时主张，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正是由于太宗时君臣一心，以失民心而亡国家、得民心则兴国家的历史规律为戒，才有了气象恢宏、中外称赞、民众安居乐业、国势空前发展的贞观之治。

唐德宗时，白居易说：“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⑤9}

宋代思想家程颐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

④5 《道德经》第74章。

④6 参见《道德经》第75章。

④7 《管子·牧民》。

④8 《管子·霸言》。

④9 《管子·君臣上》。

⑤0 《管子·君臣下》。

⑤1 《慎子·威德》。

⑤2 《韩非子·五蠹》。

⑤3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⑤4 《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

⑤5 《吕氏春秋·有始览·务本》。

⑤6 《新书·大政上》。

⑤7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2页。

⑤8 前注④，吴兢书，卷六《慎言》，第335页。

⑤9 白居易：《策林·辩兴亡之由策》。

本。”^{⑥0}著名清官包拯也说：“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⑥1}

明太祖朱元璋将赢取民心 and 顺应天意看作国家兴盛的重要条件，忤逆天意，违背民心，则有亡国之危。他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怒，未有不危亡者矣。”^{⑥2}

明成祖朱棣告诫群臣，“君国之道，以民为本”，如果臣子都能体察君王爱民恤民之心，“推而行之”，兴利除害，则不但“天下之民举得其所”，各级官吏也可“永享太平之福”。^{⑥3}又说，“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故，不可使之凋敝……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劝而民心归”。施行仁政，民心归附，“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⑥4}

邱濬说：“君之事则民之事，民之事则君之事”，朝廷之政重在“为民”，“天下盛衰在庶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右，以铭心刻骨者也”。^{⑥5}君主必须深知民之可畏，应该“养之、安之”，不能“虐之、苦之”，^{⑥6}否则，秦汉以来历代因君主行“厉民养己”之暴政而亡天下者，足以为前车之鉴。

李贤对历代兴亡的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盖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夏、商、周、汉、唐、宋，俱有天下数百年，而历世之绵远者，固结民心之所致也。”^{⑥7}

2. 以农为本，改善民生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所以民的主体是农民，民本的核心内容是农本。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从不同角度对此加以论证。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⑥8}意为农民获得丰收，君主不患无粮，国家可以因富而强。所有的民安物阜都取决于农民之“足”。

孟子认为使农民富足，最重要的是国家能够满足农民的生产手段——土地，即所谓“制民之产”，至于“制民之产”的数量，至少应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⑥9}他认为“养生丧死无憾”，正是“王道之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⑦0}他还描写了理想中的富民的田园风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

^{⑥0} 《二程文集》卷五。

^{⑥1} 《包拯集·请罢天下科率》。

^{⑥2}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

^{⑥3}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七。

^{⑥4}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⑥5} 参见《大学衍义补·定官职之品》。

^{⑥6} 参见《大学衍义补·总论固本之道》。

^{⑥7} 《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上中兴正本疏》。

^{⑥8} 前注^{③5}，《论语·颜渊》。

^{⑥9} 《孟子·梁惠王上》。

^{⑦0} 参见前注^{⑥9}，《孟子·梁惠王上》。

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⑦①}

孟子将国君为民制民之产，视作民之恒产，他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同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⑦②}农民有了恒产，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生存之忧和流民心态，使“恒心”植根于农民的意识形态之内，使劳动力能够与一定数量的土地充分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农民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为国家提供赋税。

荀子也十分重视农本，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⑦③}“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⑦④}结论就是只有农业兴旺，民众富裕，才有国家的富足和强盛。

重视农本不只是一种理念，或是善意的表达，而要落实到实际的政策措施上。主要表现为减轻赋税，减少力役之征，真正做到宽，才能有效于养。具体说来，历代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宽以养民的论述，而且落实到政策，以改善民生。

汉高帝时实行“什五税一”的“轻田租”政策。文帝时厉行节俭，“思安百姓”，改为三十税一，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为劝民重农曾多次下令减免“田租之半”^{⑦⑤}；景帝以后三十税一遂成定制，并严惩官吏乱役民夫致违农时的失职行为，“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⑦⑥}。高帝的轻田租政策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说：“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⑦⑦}可见太宗之意，凡善于耕种以安其居者则富，知晓礼仪以明教化者则贵。“富则教之”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教化百姓获取富贵之道。

唐朝最重要的也最有效的富民政策就是实行均田令和租庸调法。根据唐《均田令》，社会各色人等都取得了法定的土地所有权。武德七年（624年）颁布均田令如下：“诸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⑦⑧}

⑦① 前注⑥⑨，《孟子·梁惠王上》。

⑦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⑦③ 《荀子·富国》。

⑦④ 前注⑥⑩，《荀子·富国》。

⑦⑤ 《汉书·文帝纪》。

⑦⑥ 《汉书·景帝纪》。

⑦⑦ 《贞观政要·论务农》。

⑦⑧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武德七年，栗劲、霍存福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根据推行均田的经验,进一步修订颁行均田令:“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⑦⑨}永业田可以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口分田,本人死后还官。州县内“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⑧⑩}

此外,“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⑧⑪};“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⑧⑫};“杂户者,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⑧⑬}。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内毕”^{⑧⑭}。“良口”除依法分得永业、口分田外,还可以分得园宅地,“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⑧⑮}。

均田法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它的价值和积极作用如下:

第一,作为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均田令》由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广大农民及其他诸色人等获得了稳定的、相对持久的谋生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

第二,《均田令》所达到的积极效果是均富,农民不仅获得口分田,还获得了永业田,从而激发了精心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使丰产获得保障,在此基础上达到富足。

第三,无论官民和各色人等,都依法获得土地,官与民所获土地总体上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由于封建时代是以等级为特征的,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亩数是有等差的,由于奴婢依良丁授田,使官僚贵族之家也获得了较多的额外土地。在贯彻《均田令》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强占农民土地的现象。

均田法的实施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刺激了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仅悉心经营土地,还不断改善生产工具、合理利用土地以增加生产。所以均田法不仅利民,也有效地使民富足。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的税法,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是很低的,是和均田法相适应的,收到了疏民困、利民生的效果。史书有一段记载充分显示了唐朝农家的殷实富足和民安国强的盛世景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

^{⑦⑨}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42页。

^{⑧⑩} 参见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50页。

^{⑧⑪}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62页。

^{⑧⑫}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68页。

^{⑧⑬}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69页。

^{⑧⑭}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66页。

^{⑧⑮} 前注^{⑦⑥},仁井田陞书,第558页。

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⑧6}史书的记载难免有溢美之辞,但从中可以看到百姓富足带来的社会和谐与安定,出现了“天下帖然”“人人自安”^{⑧7}的盛世。由于民富,唐朝的府库充盈、边疆巩固、国力强盛,无论典章制度还是文化艺术都达到了成熟的形态,其影响远播海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强盛国家。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国家固本之策。清初思想家唐甄特别论证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他说:“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为国矣。”^{⑧8}

可见,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国强的效果,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源于均田法的实施。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均田法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唐朝随之走上了下坡路。这从另一面证明了爱民富民,民安国强。战国时慎子说得好:“善为国者,移谋身之心而谋国,移富国之术而富民,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则不劳而化理成矣。”^{⑧9}

此外,唐代统治者也注意自然生态。《唐律疏议》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律 169 条)“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答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户主犯者,亦计所在荒、芜,五分论,一分答三十,一分加一等。”(律 170 条)“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律 424 条)“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答五十……”(律 430 条)“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律 442 条)

以上立法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并没有意识到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今天看来,中华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睿智和富于远见。

起自布衣的明太祖对于“以农为本”的重要性,更有深刻的体会:“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⑨0}“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⑨1}“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⑨2}他不仅严禁官兵扰民,多次下令减轻赋税,还“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⑨3}。为衣食无着的贫民提供食物、衣服和房舍。此外,明太祖认为:“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⑨4}他强调施行仁政,重在使百姓得到实惠。“以朕观之,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

⑧6 《贞观政要·政体》。

⑧7 《贞观政要·奢纵》。

⑧8 《潜书·存言》。

⑧9 《慎子·逸文》。

⑨0 《明太祖宝训》卷五。

⑨1 《朱元璋系年要录·洪武四年》。

⑨2 《明太祖宝训》卷四。

⑨3 《明史·食货志》。

⑨4 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1 页。

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⑨

明朝后期,主持国政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提出,民是国家的根基,民生的安危关系到国祚的短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安民生方能固本,安民生亦是“长治久安之术”^⑩。他鉴于税法混乱,百姓不堪重负,多次上书奏请皇帝蠲除积年逋赋,安定民心。张居正针对时弊,更化国政,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赋税“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⑪,使赋税征收程序化繁为简,民众的赋税负担改重趋轻,既实现了国用充足,也使民力大为宽解。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全国的赋税额,以康熙五十年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⑫。这既表现了康熙朝经济的发达与财富的大量积累,同时也是一项最切实的利民之举,由此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丰稔。雍正朝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实行“摊丁入地”,废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税,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轻徭薄赋成为康、雍、乾盛世的标志之一。

3. 爱民富民,民安国强

史载周文王问政于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⑬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学派莫不以爱人(民)作为立论与施政的基点。孔子说:“仁者爱人(民)。”^⑭荀子说:“故人君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⑮“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⑯实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样主张爱民。法家法治之说最后也落实到爱民富民上,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⑰爱民则民安,使民无怨,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文韬》说:“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管仲认为富则是爱民之一端。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⑱他还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⑲除思想家对于爱民富民之说多有评论外,一些政治家和当政者

^⑨ 前注^⑨,《明太祖宝训》卷五。

^⑩ 《张文忠公全集·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⑪ 前注^⑩,《明史·食货志》。

^⑫ 《清世祖实录》卷二百九十四。

^⑬ 《六韬》卷一《国务》。

^⑭ 前注^⑬,《论语·颜渊》。

^⑮ 《荀子·强国》。

^⑯ 《荀子·议兵》。

^⑰ 《商君书·更法》。

^⑱ 《管子·治国》。

^⑲ 《管子·法法》。

从治国理政的实际出发,不仅阐述了爱民富民的意义,还落实到政策思想和实际措施上。

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军事家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⑩唐初,以“安人宁国”为治国方策的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⑪他还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⑫

宋朝管理地方颇有治绩的刘应龙说:“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⑬理学家程颐说:“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⑭

元代陈天祥说:“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⑮

4. 富则教之,移风易俗

第一,富则教之的必要性。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不仅从历史的镜鉴中总结了重民、富民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教民的必要性,特别是在民衣食足之后,强调富则教之。孔子在回答冉有“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问时,明确回答“教之”^⑯,他在回答子张“何谓四恶”的问题时,将“不教而杀”视为暴虐行径,列入恶政之首。^⑰孔子还提出了著名的施教之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⑱在孔子看来,民众在解决衣食温饱之后,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教化,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知是非、近善良、敦乡里、识大体、爱国家,能够自觉地进行内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义廉耻的圣训和法律的规范,从而有利于奠定国家富强的社会基础。反之,富而不教,以致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讹诈取利,足以败坏风俗、紊乱秩序,虽富但无助于国家的文明富强,反而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

主张“仁政”的孟子提出民富之后必须施行教化,否则与禽兽相差无几。“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⑲他特别论证“仁政”与“善教”不可分,“善教”有助于得民心,成为弘扬“仁政”的重要手段。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

^⑩ 前注⑤,陈寿书,第1352页。

^⑪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⑫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⑬ 《宋史·刘应龙传》。

^⑭ 《二程文集》卷四。

^⑮ 《元史·陈天祥传》。

^⑯ 前注②,《论语·子路》。

^⑰ 参见《论语·尧曰》。

^⑱ 《论语·为政》。

^⑲ 前注②,《孟子·滕文公上》。

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①⑥}他同时主张:“教之不改而后诛之。”^{①⑦}

荀子也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①⑧}

汉儒董仲舒进而主张:“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①⑨}

在利民富民的政策影响下,富则教之的意义更加凸显。如果富而不教,听任富者任意挥霍,不仅使自己的财富流失,还会引发经济秩序的混乱,导致社会动荡的加剧,甚而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除此之外,为富不仁者大量增加,也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所以,富而教之,首先在于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水平,使之“明礼仪”“知廉耻”“重诚信”“远诈伪”,成为远恶迁善、自觉内省的正人君子。随着有德之人的增加,社会风气也会随之改进,不良的风俗也会得到改善。由于古代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的大国,因此流行于各地区的风俗多不相同。其中既有良善的风俗,也有荒诞、落后、愚昧的风俗,所谓“百里不同风”。由于各地的风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历代圣君贤相在以德化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俗,使妄诞之俗归于理性、邪恶之俗归于良善,务使不义不肖之徒明礼义、知廉耻,使四海同归于德化。如同宋人苏辙所说:“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②⑩}

第二,施教之方,以德化民。中国古人对如何实施教民,多有论述。《尚书·舜典》提出对民的“敬敷五教”^{②⑪}之说,据孔颖达疏:五教即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武成》在歌颂周武王的功绩时,也有“重民五教,惟食丧祭”^{②⑫}之语。

孔子认为,德礼的教化不仅使人知耻,还能使其自觉地达到道德的标准,远胜于政刑的强制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⑬}

汉初,儒家鉴于秦始皇不务德而务刑,终为汉所灭,因而主张德礼为治。贾谊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②⑭}

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大力倡导“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

①⑥ 《孟子·尽心上》。

①⑦ 前注①⑥,《孟子·尽心上》。

①⑧ 前注⑦⑧,《荀子·富国》。

①⑨ 《汉书·董仲舒传》。

②⑩ 《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九》。

②⑪ 阮文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页。

②⑫ 前注②⑪,阮文校刻书,第185页。

②⑬ 前注②⑬,《论语·为政》。

②⑭ 《汉书·贾谊传》。

不触法禁。

西汉孝文帝以勤俭持国,力戒奢靡之风,广施善教、善政。史书称赞他:“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⑫

东汉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⑬他还说:“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⑭结论就是,“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⑮。

隋文帝在褒奖齐州参军王伽等人的诏书中指出,“以德化人”能使刑措而不用。“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理。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于此……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措不用,其何远哉!”^⑯

《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对此,宋理学家朱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⑰他还说:“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决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⑱

明初,太祖朱元璋认为,要达到天下大治,应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但推行德化的同时,“亦以五刑辅弼之”^⑲。

洪武三十年(1380年)《大明律》成,昭告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⑳“明礼以导民”旨在使民遵守礼的规范,按礼行事,提高内省的自觉,融入“弘风阐化”的纲常名教主流。“定律以绳顽”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

明嘉靖五年(1526年)三月,世宗皇帝殿试天下贡士,曾在制诰中提到:“英君谊辟,固有专务以德化民而致刑措之效力。”^㉑

清代顺康两朝皇帝均迭颁诏书,表达以德化民之意。顺治十二年(1655年)冬十月戊辰日,诏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苟律例轻重失宜,官吏舞文出入,政平讼理,其道曷由。朕览臬狱本章,引用每多未愜,其以现行律例缮呈,朕将亲览更定之。”^㉒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戊寅日,谕三法司:“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冀本敏慎庶狱,刑期无刑。故臬决之司,所关最重,必听断明允,拟议持平,乃能使民无冤抑,可

⑫ 《史记·孝文本纪》。

⑬ 《潜夫论·德化》。

⑭ 《潜夫论·浮侈》。

⑮ 前注⑬,《潜夫论·德化》。

⑯ 《北史·循吏传》。

⑰ 前注⑭,《论语·为政》。

⑱ 《朱子语类》卷二三。

⑲ 《明太祖文集·心经序》。

⑳ 《明实录》。

㉑ 《明实录》。

㉒ 《清史稿·世祖本纪》。

几刑措之风。近览法司章奏,议决重犯甚多。愚民无知,身陷法网,或由教化未孚,或为饥寒所迫,以致习俗日偷,愍不畏法。每念及此,深为悯恻。”^⑬

清代名吏陆陇其专务以德化民,“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或父讼子,泣而谕之,子掖父归而善事焉;弟讼兄,察导讼者杖之,兄弟皆感悔”^⑭。

总括以上,历代统治者对于以德化民都十分重视,其事迹多见于史书记载,以此表征德治与善政。由于民是国家的构成元素,民安则国宁,因此,通过以德化民,使民心性陶冶,远恶迁善,既巩固了国家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秩序稳定。

第三,明刑弼教。中国古代的法典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敦诚信、远诈伪,尚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可以“弼教”,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涵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是使民远恶迁善,达到以刑弼教、以刑辅教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周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强调以礼乐主宰刑罚、使刑罚“得中”的重要原因。主张法制的法家所追求的就是“在于使民知法,以法为教”^⑮“以吏为师”,故提出“法莫如显”,其目的也就是既可以使民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其自身的权益。商鞅说:“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⑯韩非说:“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⑰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指出法律的作用就在于“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⑱。特别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谛。

清人评价唐律“一准乎礼,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⑲,表达了后人对于传统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为了提倡明刑弼教,法情允协,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屈法伸情。“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⑳“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㉑

清朝在承袭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时,对政刑与礼教的关系作了经典阐述,《清史稿·刑法志》指出:“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

⑬ 《清实录·圣祖实录》。

⑭ 《清史稿·陆陇其传》。

⑮ 前注⑤,《韩非子·五蠹》。

⑯ 《商君书·定分》。

⑰ 《韩非子·有度》。

⑱ 《旧唐书·刑法志》。

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⑳ 《明史·刑法志(一)》。

㉑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

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①⑤}

5. 矜恤弱者,重视人命

中国古代的民本法文化范围宽广,内涵丰富,除上述重民、爱民、利民、富民、教民外,还涉及立法司法领域的矜恤弱者,重视人命。所谓矜恤弱者,就是对于老幼妇残、废疾、笃疾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恤刑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①⑥}“妇人犯流者,亦留住,流二千里决杖六十,一等加二十,俱役三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者被判流刑,只流遣到服役之处,而不居作。^{①⑦}“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①⑧}

至于“残”,根据《唐令拾遗》规定,“残”分为三类:“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瘰,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痼、侏儒、腰脊折、一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①⑨}凡废疾、笃疾犯罪或听收赎,或奏闻取旨。

《大清律例》仿唐律,进一步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凡老幼及废疾犯罪,律该收赎者,若例该枷号,一体放免;应得杖罪仍令收赎。……凡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①⑩}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对鳏寡孤独、老幼妇残、废疾、笃疾等社会弱势群体所采取的救助原则与恤刑原则是一贯的、辗转传承的,它是在爱民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蕴含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法律规定,为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因而也可以说是中华法系所独具的一个特点。

除此之外,对于死刑犯于执行前实行复审制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刑的处决权就收归朝廷,地方无权处决死刑犯。隋文帝进而明确规定,“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①⑪}从而将死刑的决定权操于皇帝之手。唐太宗时,因误杀大理寺丞张蕴古,悔之,谓众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颢而犹能悔,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

^{①⑤} 《清史稿·刑法志》。

^{①⑥} 《唐律疏议·名例》。

^{①⑦} 参见前注^{①⑥},《唐律疏议·名例》。

^{①⑧} 《唐律疏议·断狱》。

^{①⑨} 前注^{①⑧},仁井田陞书,第136页。

^{①⑩} 《大清律例·名例律》。

^{①⑪} 参见《隋书·刑法志》。

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⑫由此,三复审、五复审的死刑复核制度遂成定制。后《唐律疏议》规定,死刑“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复奏讫,然始下决”,“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⑬由于唐初采取了重民命、慎刑罚、援法治等一系列措施,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唐朝建立的死刑复核制度。尤其是清朝死刑执行前实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保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凡在押监候死刑待决案件,秋审时由九卿负责审核。秋审的结果,凡应处死的案犯,上报皇帝,由皇帝御笔勾决。

三、民本思想的历史镜鉴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影响极为深远。但民本思想毕竟是历史中国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和局限性。因此,民本思想是菁芜并存的,需要深刻地认识到其囿于时代限制的一面。

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民本是专制主义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民本,民本思想的萌发、实践和发展,均离不开圣君贤相的推动。遇有开明的统治者,则上下同心,重视民生,使政令畅通,教化广被,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遇有昏聩平庸之辈,则上下其手,残民害民,以致法纪废弛,道德沦丧,百姓冤抑丛生,国家陷于倾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毫无“民本”可言。因此,传统话语体系中的“民本”对明君、贤吏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杰出的思想家们在对现实苛政的批评中不断加强对“民本”的主张,同时,又念念不忘“致君尧舜”,希望借助圣主明君来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这就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所主张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有着显著区别。

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本”语境催生出“义务本位”的法律观。尽管历代法律规定了百姓享有从事生产、经商等各项权利,但比起国家要求百姓所负担的各种义务,是微不足道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宗法家族制的社会结构、长期遵循的儒家思想以及强调百姓履行义务的历代法制建设,均使得“民”必须承担义务方能赢得尊重和保护。加之传统社会奉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道德标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对等,甚至出现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贱对贵、幼对长只能恪守义务而不得主张权利的现象。在这种“义务本位”法律观的基础上,“民本”无法充分释放百姓的活力和对权利的渴求,也无从产生具有浓厚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公法发达而私法的发展特别是法典化相对滞后,传统法制也无法顺利地完

成向现代法治的蜕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存在种种不足,但这些不足绝不意味着腐朽、落后和保守,恰恰相反,民本思想仍是一座内涵丰富的宝库,是千百年来王朝兴亡史

^⑫ 《新唐书·刑法志》。

^⑬ 参见前注^⑪,《唐律疏议·断狱》。

的重要总结。在民本思想中,有许多古圣先贤刻苦研究抽象出的古今适用的民本理论,显示了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理性思维,本文中提到的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为国,得民心者得天下,宽养民,爱民,利民,富民,教民,恤民等一系列概念都经历了历史风雨的锤炼,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洋溢着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的中华法系,曾经傲然自立于世界法系之林,而且影响相邻国家千年之久。因此,民本思想不啻为世界法制文明的瑰宝。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以下借鉴意义。

第一,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渊源。“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⑮他还强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正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⑰。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此意义上,“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相通的。“以民为本”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弘扬和阐发“民本”的思想价值,坚守人民立场,把握人民需求,回应人民关切,落地惠民举措,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民本”之基。

第二,重视民本思想的历史文化积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也是重大的民心工程。如何选择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特别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而五千年发展演进的民本思想,在实现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相结合,迸发出了雄厚磅礴的历史伟力,振奋了中华儿女求解放、求富强、求复兴的精神追求,使传统中国以“兴国安邦在得民心;宽以养民,改善民生;爱民富民,民安国强;富则教之,移风易俗;矜恤弱者,重视人命”等为核心的民本理念实现了向新中国强调以“人民性”为治国理政根基的重大飞跃。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和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使得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是振奋寰宇的时代强音,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所以,民本思想启发着世人,治国理政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使人民真正成为政权的主体,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实施国家的大政方

⑮ 参见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⑯ 参见《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第1版。

⑰ 参见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

针;此外,还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加强文化教育,引导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教化兴而风俗厚”。

第三,坚持法治建设,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重民、爱民、富民、恤民、教民,始终是中华民族血液中最鲜明、最珍贵的基因。民本思想的发展进路和基本理念,激励着后人要不断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汲取五千年中国历史理性思维的成果和智慧,也昭示着后人要准确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加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积极推动中华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成功经验也告诉世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法治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造福人民。这就意味着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又是决定法治建设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折不扣地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也贯穿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环节和各领域,决不能仅仅体现在立法中而忽略了后继的法律实施活动。今天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厉行法治,更要以人民为中心,传承历史基因,坚持群众路线,筑牢为民初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良法善治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坚强保障。

Abstract: From the booming and declining history of th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Qin and Sui, it can be seen that ‘A country with people’s support will boom, a country without people’s support will decline’, which is an eternal historical law.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and politicians also summarized the basic ideas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 from reality, including that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afety rely on people’s support; the country takes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improves people’s livelihoods; the country needs moderate law to increase people’s wealth and improve livelihoods; the country becomes strong only when it provides stable life for people by caring for and ensuring prosperity for the people; the country should promot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rich, improve traditional customs, empathize with the weak and value human life. Though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has inevitable limitations, it still provides some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oday’s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游)